

知行合一的现代主义实践

——解读王维仁的建筑学术与创作历程

The Modernist Practice for the Unity of Knowledge and Action:
Interpreting WANG Weijen's Architectural Research and Practice

张轶伟 | ZHANG Yiwei

摘要：本文有意识地把王维仁的学术活动和建筑实践置于中国建筑教育和建筑设计现代转型的历史框架中。通过早年求学执业经历的回溯、教学与研究的互动、个人建筑实践的评述三个层面来立体地呈现王维仁知行合一的研究视野和设计主张，以连贯的建筑设计史视角来审视其所内含的二重性。借助个人活动的微观聚焦与历史背景的铺垫，并横向对比大陆的建筑实践，从而反思高校建筑师群体的身份认同与价值观。

关键词：建筑学术与实践、合院类型学、建筑设计史、现代转型、二重性

Abstract: This article consciously puts WANG Weijen's academic activities and architectural practice in the historical framework of 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 of architectural education and design practice in China. Through the retrospect of WANG's early years of studies and work experiences,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eaching and research, and his architectural practice, it comprehensively depicts WANG's unification of theoretical research vision and design proposition. It further examines the inherent duality from a coherent historical perspective of architectural design. This article is to demonstrate the identity and common values of college-based architects by shifting the focus from WANG's activities to the review of their historical background, parallelly comparing with the architectural practices in mainland China.

Keywords: Architectural research and practice, Courtyard typology, History of architectural design, Modern transformation, Duality

高校任教的建筑师群体在中国现代建筑领域一直扮演着具有二重性的角色。首先，他们需要参与学术体系内的知识生产与传播以体现高校教师的基本职能，同时，还要肩负着面对客户的设计任务，以实现其服务社会的设计能力转化。在这一群体中，香港大学建筑系教授兼研究室主持建筑师王维仁是其中一位突出的个体。作为现代建筑的追随者，其1980年代求学的台湾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为他提供了一片讨论、实践和反思现代主义建筑的知识土壤。延续自身教育的价值判断，王维仁1990年代起至今在大陆和港台地区的建筑实践从空间形式语言、设计方法和价值观念上都呈现了

一种不断优化的稳定状态，并与他作为教师的教研活动形成互动。这就引发了针对建筑师个人轨迹的追问，现代主义建筑的基本原理在何种语境、以何种程度、通过何种渠道实现从理论知识向实践经验的流动？个体建筑师的活动又如何反映建筑师群体共有的时代特征？基于上述论述，本文将从一个连贯和中观层面的历史视角来梳理王维仁的教育和执业经历，并把他个人活动的线索放置于中国建筑教育和建筑设计现代转型的历史框架中。限于篇幅，本文主要从早年教育背景、港大教学研究和两岸建筑实践三个层面对王维仁进行访谈，并以此为线索展开讨论。

作者：
张轶伟，深圳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建筑历史与遗产保护研究中心助理教授。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科学基金资助项目(51908361)

一、乡愁与辗转：现代主义的建筑教育与实践

1. 早年台湾地区建筑教育的影响

王维仁在多个场合反复提及，台湾地区的建筑文化传统是他建筑研究和创作的原点。1985年，王维仁于台湾大学土木工程研究所的都市计划（urban planning）专业硕士毕业。他具备地质与土木背景，而最终选择从事建筑设计。他的求学经历与1970和1980年代台湾地区建筑文化的转型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也给学生时代的王维仁带来了两种持续性的影响。一方面，影响来源于台湾地区1970年代现代主义建筑教育的引入和本土化的过程。汉宝德为代表的一批留美学者和建筑师为台北建筑院校带入了包豪斯的教学体系，并在教学中贯彻了现代主义的空间形式语言。另一方面，影响还体现在对于建筑社会性的思考。王维仁就读的台大“都计室”（都市计划方向）起到了先锋性的作用^[1]。比如，夏铸九发起的“无壳蜗牛运动”就开始对政府的公共空间、房地产政策产生质疑，并在当时的师生中产生持续反响。

王维仁一直很珍视早年台大的求学经历，并在回忆中多次谈及。夏铸九教授开设的“建筑环境导论”成为建筑启蒙的基石，并引导他进行景观建筑学的思考；大学时期广泛建筑阅读的习惯引发他的理论探索和思辨；大学服役时所接触的闽南四合院成为他日后进行合院类型学设计研究的素材^[2]。

1980年代，台大的建筑教育与仍处于变革初期的大陆地区建筑教育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后者更强调从美术建筑的角度培养学生对于形式的感觉，而忽略了建筑学的社会和环境维度。与大陆地区“文革”后受教育的建筑师有所不同，非“布扎”（Beaux-Arts）与泛建筑本硕的教育并未赋予王维仁较为系统的建筑技能，特别是关于古典主义的教育，却塑造了从自然环境到都市环境的整体观念，并成为他知识体系和设计方法上的自觉。

2. 美国西海岸现代主义建筑的思潮

在台北完成硕士课程之后，王维仁于1985年赴美，于1987年获得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建筑学硕士学位。相对于美国东岸，伯克利分校的学术传统更关注于宽泛的城市议题，包含建筑环境、城市社会学、地域主义等，其中不乏科斯托夫（Spiro Kostof）、卡斯特尔（Manuel Castells）、亚历山大（C. Alexander）等学者的思想碰撞。另一个外部因素则是1960年代后形成的学生运动与批判文化的传统。王维仁曾坦言，自己从台大到伯克利分校的学习保持了一种关于建筑与环境思维的连续性。这种知识层面的连贯来源于他未曾中断的城市理论阅读，同时形成了理论思辨和自省的敏感。

“大家讨论凯文·林奇（Kevin Lynch）往往是《城市意象》（*The Image of the City*）中对于抽象形式要素的分析。但对我来说，他的《城市形态理论》（*A Theory of Good City Form*）一书更有启发。好城市的价值和特征其实并不是边缘、轴线、标志这些简单的形式要素。林奇提出这些概念其实受到了舒尔茨（Christian Norberg-Schulz）的影响，尤其是后者早期对于拓扑学的研究。但林奇对于好城市的理解其实更为具体，在于城市的表现（performance），并用另一组非视觉的概念来具体化，比如多样性（diversity）、身份（identity）、通透性（porosity）等。”^[3]

在笔者的访谈中，王维仁曾反复强调阅读凯文·林奇、舒尔茨、罗西（Aldo Rossi）著作时的体验。这种对于经典城市理论的“反刍”并非学究式的理论解读，而是多年建筑实践后的知识性回顾。具体而言，他反对把城市中的复杂要素进行简单的形式抽象，应当以体验、感知和参与的方式来理解认知城市。上述阅读经验的影响是长久和稳定的，王维仁也谈到自己多年后的建筑实践仍保留了这种对于场地的敏感，并成为一种固定的工作方法。

“我记得当时参与设计位于屯门的香港岭南大学社区学院，在开始阶段，项目组

和校方开完会后去基地勘察。大家去基地大约看半个小时走一圈后，各路建筑师和顾问都各自散去。我通常在基地至少需要待个大半天，在山坡的果树林来回溜达，感觉坡地的起伏和树木的光影，找寻和设计相关的特殊线索，想象未来建筑量体和现在基地的关系。在不同基地的勘察过程中如果遇到当地的居民，我一般会上前攀谈了解他们对于场地的感受，即便是新建筑完成后他们多半不会留在这里了。这样的思考已经成为我方案构思阶段的固定习惯。我也会自问，这个本能的反应是如何形成的？大概就与台大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建筑教育中关于场所和环境的重视相关。”

伯克利分校求学经历同时完善了王维仁关于合院类型学的设计方法，并帮他建立了合院形态东西方普适性的认识。这种方法论层面的影响从现代主义建筑的规训渗透到对美国西海岸地域性建筑的领悟。例如，辛德勒（Rudolph Schindler）在加州的住宅不仅有着巧妙的院落关系，其类似“缘侧”的空间界面甚至包含对东方空间理念的回应（图1）。此外，王维仁还间接接触到北欧现代主义建筑因地制宜的策略。他曾回忆，建筑系芬兰籍的教师曾在设计课上用阿尔瓦·阿尔托（Alvar Aalto）的建筑来讨论合院、地景与空间策略的关系（图2）。尤其是在赫尔辛基理工学院（现阿尔托大学）的校园规划上，阿尔托把院落的尺度放大到校园空间组织层面上，作为一种协调建筑实体和地景的工具，相互关联，形成完整的院落空间系统（图3）。这种对于合院品质的关注从学生时代的模糊认知转化为他后来在台湾地区建筑实践的类型学方法，并在建筑实践多年后亲自访问芬兰阿尔托的建筑作品得到印证和强化。

在伯克利分校的学习经历是王维仁转向美国执业建筑师的分水岭，同时也奠定了他学术研究、建筑实践的基本立场和向度。

3. TAC 事务所的专业训练

王维仁职业建筑师的生涯始于格罗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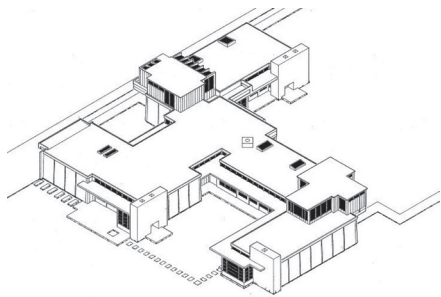


图1: 辛德勒设计的加州 Kings Road 住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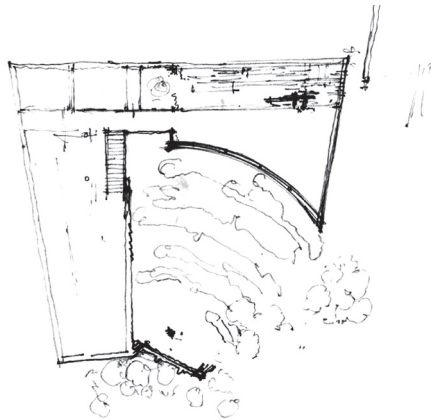


图2: 阿尔托的赫尔辛基工作室平面图草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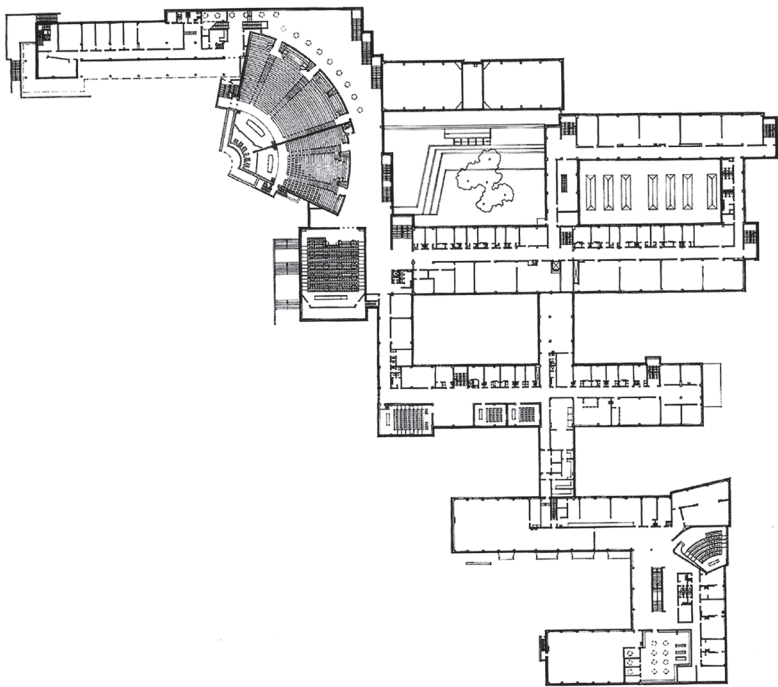


图3: 阿尔托大学教学楼群合院的空间组织

乌斯 (Walter Gropius) 创立的 TAC (The Architects Collaborative) 建筑事务所。随着包豪斯模式在美国日益式微, TAC 事务所虽然经历了从追求现代主义理想的精英事务所向强调流程制度的大型设计公司的转变, 但仍然维持着一定的现代主义价值与强调全能的专业传统。1987—1994 年的工作经历让王维仁体验了美国大型事务所的制度和机制。与此同时, 随着实践经历的增长, 他也产生了职业建筑师和兼职建筑师身份抉择的彷徨。

王维仁在 TAC 时期第一个独立主持的公建项目就是贡萨加大学 (Gonzaga University) 图书馆 (图4)。他在工作的第三年, 作为项目主持建筑师全程参与了这个工程。在笔者的访谈中, 他

也提及从项目设计到实施过程中的思考, 比如华人建筑师如何与设计团队和施工方进行沟通等。实际上, 王维仁对于大型公司的优势和弊端有着清晰的认识, 并有自己独立的见解。这种价值判断诱发了他利用工作之外的时间进行个人建筑实践。TAC 时期个人完成的小建筑——陶艺家工作室 (Ceramic Artist Studio) 和旧金山南公园画廊 (San Francisco South Park Gallery), 则是他个人建筑追求的体现 (图5)。这两个项目业主分别是伯克利东语系的教师和王维仁的旧金山友人。项目本身并不复杂, 却是独立建筑师起步的跳板。颇具戏剧性的是, 王维仁当时邀同时期旅美的张永和、鲁力佳来参加项目开幕, 这个落地项目也给当时仍



图4: 恭萨加大学图书馆外景



图5: 旧金山南公园画廊项目室内

潜心于“概念建筑”的张永和以巨大震撼，并触动了他回国创业的念头^[4]。在今天看来，这两个项目并非最具代表性，但却预示了建筑师从大院向个体事务所工作模式的转变。

二、教学与研究：高校建筑教师的身份认同

1. 从设计教学到历史研究

1994年，36岁的王维仁并没有选择台湾故土和熟悉的加州，而是来到香港大学开始自己的执教生涯。关于他从教的缘由和趣闻也曾有过相关讨论，并引发了高校科研抑或设计导向的反思^[5]。这种科研与实践的矛盾在王维仁的学术活动中取得了一种微妙的平衡：始终保持学术志趣和内在的知识分子情结，但又不向强调指标的科研考评机制妥协，坚持建筑设计本体的核心价值。

1990年代，留美背景担任系主任的黎锦超（Lye Kum Chew）对于香港大学建筑系的发展影响深远，并推动香港建筑教育的国际化发展。王维仁的教学履历包含了从基础课程到研究生联合教学的各类设计课程，教学场所也布于大陆和港台地区的建筑院校。但这种差异性总能回归到现代主义建筑教育的基本话语中，比如针对空间、类型、建构、物质性（materiality）等本体问题的讨论。在他近年来主持的研究生课程中，“合院类型学”“参与性策略”（participatory strategy）、“城市肌理”这些话题与特定的场所发生关系，并借助于一些惯常的教学法来展开，如图底关系研究、模型操作、“原型-变化”（prototype-variation）的排列组合等。

作为一位偏重设计为主的教师，王维仁的历史意识是主动而变通的，他也在繁忙工作之余坚持进行了北京、山西、安徽等地四合院的调研。这种针对合院建筑流布的考察并非纯粹史学研究，其目的在于方法学的总结，并和特定的社会关系相关联，以回应“叙事肌理”或城市文化记忆。

他教授的理论课程“中国城市设计”“中国与东亚的建筑历史和理论”也反映了这种倾向。研究对象跨越传统城市、移民城市和当代城市，集中于对形态和肌理的兴趣。这一点，在商业建筑文化主导的香港建筑界是独树一帜的。

王维仁于2012年到2016年担任香港大学建筑系主任。在领导港大建筑教学研究的四年期间，他突破全球化过程中建筑媒体潮流的迷思（myth），正视建筑面对日渐严峻的环境与社会问题，倡导建筑教育回归空间与建构本体，通过建筑地域性及其知识体系的建立，来面对全球语境的环境与社会挑战^[6]。这一建筑教育的清晰导向与他个人设计教学思想是一致并延续的。

2. 策展与学术服务

除了教学，王维仁还积极利用公共媒体和校外学术平台表达自身的学术主张，这其中最重要的是展览。作为主策展人，他在2007年香港/深圳城市建筑双年展和2018年威尼斯双年展——香港展览的经历是两个重要的节点。对于2007年港深双年展的初衷“再织都市”（Refabricating Cities），王维仁有着明确的论述：

“当时，香港掀起了一种关于城市文化的讨论，一种反省和自我意识的重构。这又追溯到1997年香港回归之后城市身份的追问。我是谁？我的城市是何种状态？我们城市空间的价值与潜力是什么？从简单的“香港制造”情怀，转变为一个更重要的城市肌理诠释与再发展的命题。与之同步的是，在资本与媒体全球化的浪潮下，我们也开始追问当代香港建筑的本质特征。应该说，香港城市建筑特色既包含来自空间资本化的效率理性，也包含早期现代主义的合理性，以及来自民间具有本地特色的有机创造力，比如多元的社区微空间与广告牌、城市的自动扶梯、步行连廊与天桥这些构筑物。”

相对于马清运激进的“城市再生”的策展宣言，王维仁“再织都市”的主张回应了香港特定的城市演变。这次策展呼应

和促进了香港当时兴起的历史建筑保育和活化运动，并直接推动了赫尔佐格与德梅隆事务所对“大馆”（原中区警署）的成功改造（图6）^[7]。更重要的是，展览促进了香港与内地建筑文化的交流，从1990年代之前香港经验的输出转向一种两地差异性的对话。

2018年王维仁在威尼斯双年展——香港展览的策展中重提了“肌理”和“地景”的概念，并围绕着香港城市建设无法逃脱的高密度问题，以“铅笔楼”这样当地特有的类型来进行演绎。

“塔楼是重视经济效率但空间相对乏味的一种类型，同时也是我们当下城市接触最多的一种建筑类型。在过去的10年，我在深圳、香港参加了无数塔楼设计竞赛的评审。不管是在前海、后海还是深圳湾，新CBD的建设都和塔楼绑定在一起，而塔楼的创新似乎过于单一，只是表皮和形象。如果高密度城市的土地节约出来以保育更多自然绿地，我们应该重新思考高层建筑的类型创新，思考塔楼可能发展的城市与自然空间、社区与文化空间……即便我没有机会去设计大型集合住宅、写字楼这些商业事务所主导的类型，我们也应该以展览和学术研究的方式来突破这些规则的边界。”

如果高层建筑不可避免，那么如何以“重塑垂直肌理”的方式给高层建筑带来新的可能成为王维仁本次策展的假说。展览以“半命题”的方式（十字形、L形、框架三种类型和三种不同高度形成9种可能性）邀请了众多香港与外地的建筑师，打造了100栋100米的塔楼，并以一个近乎严苛控制的类型学方式来呈现（图7）。

作为高校教师，王维仁一直知行合一地进行各类学术活动，以体现学术性和社会服务的统一。他同时冷静地看待资本介入与教师社会活动间的关系。“相比面向市场的职业建筑师，高校建筑师一个很珍贵的条件就是在大学教书，与市场保持相对的独立性。香港的高校能够充分保障教师的教研与生活，让作为教师的我有动力



图6: “再织都市” 2007 香港/深圳城市建筑双年展开幕式



图7: “垂直肌理: 密度的地景” 第十六届威尼斯双年展 - 香港展览

和资源来进行一些在专业市场语境里不易展开的研究工作。”

三、平行与交汇：港台及大陆建筑实践的拓展

1. 合院主义的演化

王维仁独立的建筑实践始于1992年个人事务所的创立，并和他的教学活动保持平行^[6]。在他看来，建筑师和教师的双重身份包含着职能的分离和设计思想上的交汇。整体上看，王维仁的建筑实践极为专注地集中于校园与城乡建筑，并围绕着“合院主义”（courtyardism）有着清晰的演化，形成“都市合院”“地景合院”和“合院叙事”三种类型（图8~图10）。

“都市合院”主要应对激变的城市环境，并对高密度的建设有所回应。建筑师试图把平面中宜人尺度的院落空间垂直化，并通过剖面组织形成不同类型的立体

交往场所与公共空间。这种空间策略早在西安交大竞赛（2000）的方案中就初露端倪，并对国内大学校园的千篇一律的设计产生过冲击。岭南大学社区学院（2009）和香港理工大学社区学院（2009）最质地反映了这种都市三维空间的特征。除了建构表达和材料施工的限制，王维仁在这两个案例从个体院落空间模式经过叠加、放大和串联的重构中，看到了更多的机会。这些思考在王维仁新近落成的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校区（2019）的学生中心、图书馆、书院等单体建筑中得到了发挥，也把“都市合院”的完成度进一步推进。

“地景合院”的诠释来源于建筑师对自然地景的关注，以及对于场地的理性分析和直觉判断。建筑“锚固”于场地，并形成围合与交织的环境对话。这种类型最接近于王维仁内心理想的设计条件，但这种理想的实现也同样依赖于场地的特殊性。台湾地区“9·21”地震后，他完成的中坑小学（2001）、福民小学（2002）

和光隆小学（2002）都体现了尊重场地现状的原则，尽可能地保留树木，以开放的院落组织地景空间。在延续更早期的台南艺术大学音乐系（1999）设计理念的基础上，这三个重建项目进一步体现了合院类型学、场所精神的方法论，完成了从知识到实践的转化。而在白沙湾海水浴场服务中心（2007）的项目，这种形态操作更为放松，并利用缓坡的楼板来制造强烈的地景效果。

“合院叙事”的关注点则转换到乡村语境下院落空间的演变，结合了社区的尺度与社会关系，以及村落的历史和人文叙事。这一立场源于王维仁一贯对于社会空间变迁的细腻洞察和强烈的建筑历史意识。从香港菜园村（2015）、松阳平田村（2016）到界首村（2017）的空间实践中，建筑师对于平面肌理的研究不仅是诺里地图（Nolli Plan）式的图底反转，更充分考虑新旧空间的变迁、材料感知体验以及建筑构件与建构的文化意义。



图8: 都市合院: 香港理工大学社区学院



图9: 地景合院: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校区(一期)



图10: 合院叙事: 平田四合院重建天井

“这几个关键词源于我对于建筑持续的思考，我也不断地在重新定义它们的意义并且梳理它们之间的关系。我希望尽量不为单个项目进行即兴式的概念标签，而是持续发展与演化一直存在于潜在设计思维中的信念。”这种合院与地景类型学并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一种非此即彼的划分。在实际项目处理的时候会相互交织，并形成一种立体关系。对地景与自然的思考似乎是项目开始的一种场地本能，并来源于建筑师的素养、体验与个人信念；形态学和类型学则成为一种操作方法，让空间价值转化为设计方法，并让项目推进的过程更具有逻辑性；叙事则更能帮助自己返璞归真，成为建筑师的人文社会价值和历史意识的一种表达方式。

2. 建筑本体的讨论

纵观王维仁的教育和执业经历，他把早年对合院民居的感性认识、现代主义建筑关于合院组织的先例 (precedent) 转化为一种空间类型学的工作方法，在实际项目中也采用了理性的设计思维，并集中于建筑本体的讨论。他对于合院类型学的经验在于通过空间形态的分类形成诸多可能性，在设计推进的分叉点找出其中的可行方向并予以深化 (图 11)。这种分析、综合的线性逻辑让人联想到 1960 年代以来

的现代设计方法学。另外，王维仁采用的形式和类型研究并非延续美国学院派理论主导的形式主义 (formalism) 轨迹，而是相对质朴、在地和本体的。这意味着建筑形式更多来自于内部空间秩序、结构逻辑和场所环境的考量。这也能够和他所推崇的阿尔托、西扎 (Alvaro Siza)、凡·艾克 (Aldo van Eyck) 或阿斯普朗德 (Gunnar Asplund) 的观念形成呼应。

建筑本体的讨论同样体现在模型作为一种推进设计思维和表达的工具。在王维仁研究室的搁板上保留了他不同时期和设计阶段的工作模型，并能随时进行比较 (图 12)。这似乎是一种很“建构”的工作方法。从台中的三个小学开始，他就形成了一套基于图解和物理模型的工作方法：通过体量模型推敲场地关系，然后逐步放大模型，由中观层面的模型讨论平面和剖面上的空间组织，最后由大比例的节点模型和图解来思考建筑细部与构造的处理。这种工作方法从早期的台湾校园实践一直延续到他新近落成的港中大深圳校区的规划和单体建筑。

经典现代主义建筑所发展出的思维方式与术语，诸如场地关系、空间操作、材料表现、结构逻辑、建构思辨等，都可以从王维仁的作品中得到清楚的呈现。这种建筑本体的表达贯穿于他的实践和研究，知行合一而并没有形式语言和设计观念的断裂和飞跃。

3. 社会意识与社区参与

讨论王维仁建筑实践另一个不能缺少的维度就是社会意识。相比强调在地建造的建筑师，王维仁的实践场所在港台地区与大陆切换，并且包含了城乡差异、内陆与沿海气候条件的差别。这种场所的复杂性却并未带来其价值判断的摇移，反而凭借对不同场地和社区重新认知的本能反应，让社会意识与人文参与一直成为建筑师实践立场的一部分。

“社区总体营造”是早年王维仁建筑创作一个独特的立足点。1990 年代台湾地区的“社区总体营造”可以追溯到日本的“造町运动” (老街保存计划) 和 1970 年代林奇等美国学者倡导的社会性建筑。社区营造所宣扬的自下而上、民众参与、凝聚社区精神等观念也和建筑的社会实践充分融合^[9]。王维仁在台湾地区震后的校园重建项目都明显地带有类似的倾向。他也在访谈中感慨，台湾地区高校师生在校园建设中的参与意识，以及建筑完成后十多年对维系建筑环境的观念细致入微，是他难能可贵的经验。

香港新界菜园村的生态住宅项目是王维仁香港建筑实践的一个分水岭。这个项目的直接缘起是 2010 年前后香港高铁建设所引发的拆迁问题。当时有一批社运参与者介入并帮助市民进行抗争。在这个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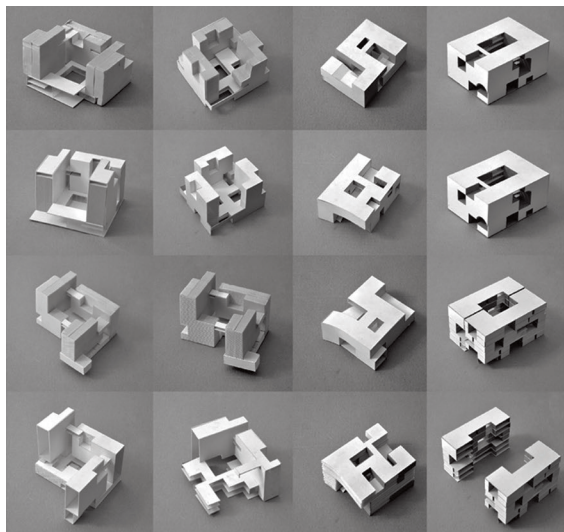


图 11: 基于空间类型学的工作方法



图 12: 王维仁建筑设计研究室保存各项目的工作模型

目中，王维仁延续了合院类型学的方法，采用“原型—调整”(prototype-variation)的模式。建筑师以三开间、天井和院落的围合发展出三种原型，并引入一套居民参与的机制来调配户型，最后发展出40多种不同户型以适应居民需求(图13)。这个项目的重心并非只是设计本身，更在于协调居民的空间关系、环境资源的分配和项目过程组织上。项目土建设计于2011年左右即告一段落，但王维仁团队却持续十年，陆续参与了项目的环境整治和运维推进，并持续进行项目的回访。这种强度的社区营造虽然在他之前的项目中不曾遇到，但这一意识已通过之前的建筑教育和知识积累固化下来。

浙江松阳平田村和界首村的乡村实践也延续了王维仁的社区工作策略。这类项目首先解决的是建筑本体的基本问题，如木构架、夯土、构造做法等物质层面的问题，并需要在经济和物力条件有限的情况下得以实现(图14)。建筑师在设计过程中必须理解业主、工匠的工作方式，以他们的能力经验调整设计决策，并全过程参与建筑实践。王维仁提出“叙事空间”和“叙事建构”的策略，就是试图把城乡肌理的抽象形态学研究与社会关系、空间历史的演变和居民的主动参与相融合。这一初衷也是他的乡村实践所不曾改变的。

王维仁希望把自己的活动和国内近年来乡建热潮保持一定距离，并采用自己独立的工作方法，通过主动参与和引导来协调建筑师和使用者之间的矛盾。这种学术和价值判断同时投射在他对于建筑本体和其基本要素的论述中：

“乡建本身和引发的问题我都一直关注，并从属于我提到的三种基本要素的相互关系：建筑与自然、建筑与社会、建筑本体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在乡建中体现得更为具体和直白，并且对我而言是异常亲切的。这种类型的实践条件对比我之前执业的城市环境，比如旧金山、香港或深圳面临的密度与土地困境，其实是巨大的反差。正由于上述反差，让我们有机会重新检讨城市所失去的自然与社会关系，形成一种城乡的张力与反思，思考一种建筑与地景合院的城乡策略。换句话说，我对于建筑类型学甚至建筑本体的理解也来源于场地，来源于乡村和自然，希望在高密度的城市中建立自然与社区的尺度，因缘际会，最后也能再度回归到自然与乡村。”

四、讨论

王维仁四十年的建筑学经历形成了从学校到设计机构、从学术到实践相互切换的轨迹。这类知识输入与经验输出的转化又验证了他所奉行的现代主义建筑历久弥新的基本理念。他的个人历程也能够放置到中国建筑教育和建筑实践现代转型的大背景之下进行讨论。

1. 从校园建筑到实验建筑

正如前文所述，王维仁建筑实践的类型高度集中于校园建筑。从1990年代开始，“大学城”建设与“产、学、研”一体化的讨论曾经是一个热门话题。如果说

1950年代创立高校设计院的直接目的在于解决本校校舍建设的内需，为学生提供实习机会，那么，1990年代后的建设趋势则把一批高校设计院推向市场舞台，并创造品牌和经济效益。城市化进程和巨大的建设量导致相当数量的教师参与实践，并加速了高校设计院的扩张。王维仁对于“大学城”建设有着校园尺度和场所精神层面一贯的反思，但同时也逐渐体会到中国建筑高速发展的三十余年中，“大”与“量”的问题是前所未有的挑战^[10]。这一时期，王维仁主要在台中、台北等地参与小体量的校园与社区建筑实践，更关注于在地建造、场所精神和居民参与这些本体和社会性的问题。2000年左右，张永和的晨兴数学中心与张雷的南大陶园学生公寓的建成，标志着一种对于传统校园建筑形式美学的批判，设计的关注点也从建筑外部造型转向内在空间、结构、材料逻辑性的思考，并开启了空间与建构的讨论。与此同时，王维仁在台湾地区的校园实践系列也被大陆建筑界重新认识，并引发了关于建筑本体性和在地性的思考。

对于国内建筑界而言，王维仁最初被认知的身份之一是“实验建筑师”。重新梳理王维仁在国内建筑实践的起步，一系列集群设计的项目可以被罗列，如四川建川博物馆、北川中学、杭州西溪湿地艺术村等，延续到近年的什刹海苇坑胡同改造与松阳的村落实践。这反映了他与一批推崇变革的大陆建筑师的关联，并逐步从边缘实验走向学术中心。以历史视角回溯，1990年代末国内兴起的实验建筑现象引发了学术圈一连串理论先行的思考：自觉重新引入西方现代主义建筑，呼吁本体性的建筑话语，抵抗宏大叙事和形式主义，并凸显个体建筑师的作用。这种知识层面的效应某种程度上正是对于王维仁学术和实践经历的评述。

2. 局外与局内：知行合一的二重性

在对王维仁建筑教育和实践的历史表述中，我们始终可以找到清晰的二重性特



图13: 菜园村项目三种空间原型与体块模型



图14: 界首村村落空间重建施工现场

征。作为一个在中国大陆和港台地区活跃的建筑师，他的身份既是港台移民建筑文化一种他者的参与，同时又与大陆的建筑传统不断地互动；他的实践主张既有立足城市的“都市合院主义”，又能够扎根村落的乡土与社区；作为一名积极参与实践的建筑教师，他既具有职业建筑师的专业特质同时兼具传统知识分子的文化情结；既延续经典现代主义建筑教育的传统，又体现台湾地区本土建筑的在地和参与。王维仁曾援引自己深受影响的具有萨义德（Edward Said）意味的“自我放逐的人”^[11]，保持中立边缘同时积极参与。事实上，上述二重性并未带来学术主张的分离，并高度统一于王维仁建筑教育和实践的核心价值——现代主义的空间形式语汇、建筑环境观和建筑社会性的讨论。

从中国建筑教育和实践的现代转型来看，对于建筑空间、形式等本体问题的认知变迁是一条可描述的线索。我们逐步淡忘“造型”“构成”这些词汇，并转换到“建构”的话语，又从建筑本体的研究，转向社会意识的关注。在这种转变的历史进程中，王维仁既呈现出“局外”到“局内”的二元立场，又一如既往地置身建筑现场，成为知行合一、身体力行的参与者。他的建筑活动不仅是对中国大陆和港台地区不同实践语境的调适（adaptation），同时也积极促进了现代建筑基本原理跨文化层面的交流与融合。

注释

[1] 1975—1977年，台大土木系陆续聘请留美的王鸿楷与夏铸九回台任教，并在交通工程组的基础上成立“都市计划组”。“都市计划组”的方向反映了二人的研究志趣和学术主张，他们要求学生不仅要专业上对于建筑本体的问题有所思考，更应当对专业所处的文化、社会脉络进行有意识的反思、批判与改良，同时还应关注弱势群体和不发声的团体，并对地方历史文脉有着特殊的情感。

[2] 朱涛. 合院的重复与变奏——读王维仁的建筑实践[J]. 城市环境设计, 2011 (09): 78-81.

[3] 笔者于2019年12月21日对王维仁的访谈，后文引述文字（楷体加引号部分）均为访谈节录，不再单独说明。

[4] 王维仁谈道：“鲁力佳多年后告诉我，张永和在看这个小项目之后很受震撼。他之前一直在做概念设计和竞赛，但一下看到这么一个完成的建筑后有很大的冲击。空间概念是很简单和基本的，但是建筑盖好之后的力量远比概念建筑更大。这件事是个转折点，之后张永和就决定回国进行建筑实践了

（笑）。张永和在美国伯克利教书之后还去了莱斯大学（Rice University），那段时间我们保持了间断的联系，一直到他回北京而我去香港任教。”

[5] 顾大庆. 王维仁素描——一个在香港教书的建筑师[J]. 城市环境设计, 2011 (09): 92.

[6] 2012-2015 Year Book/Prospectus, Department of Architectur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7] 王维仁, 钟宏亮. 思考: 再织城市[M]. 香港: 牛津大学出版社, 2010.

[8] 在事务所初创阶段, 王维仁通过假期参与竞赛来更多地参与实践。1997年后, 团队运作逐步稳定, 并在台湾、香港陆续有项目落成。2007年后, 事务所搬迁, 并形成了更为稳定的格局。

[9] 黄健敏. 台湾民众参与的社区营造[J]. 时代建筑, 2009 (02): 36-39.

[10] 王维仁对张永和在港大讲座中建筑之“大”（bigness）的讨论记忆犹新：“我曾找张老师来港大做讲座，主题就是‘大’。他当时在北大任教的同时主持非常建筑事务所，并不自主地完成了若干大体量的建筑，个人的兴趣点不再是早期的‘概念建筑’而主动转向城市问题。据我个人观察，这是当时一批实验建筑师自主的转变：从边缘走向中心，从建筑本体理论和概念层面的思辨转向城市和社会的思考。其实这个阶段不只是校园建筑，国内所有的建设都向着‘大’的方向发展。”

[11] 王维仁, 朱涛. 再织城市——朱涛与2007深圳-香港建筑与城市双城双年展策展人王维仁对话[J]. 时代建筑, 2008 (01): 134-137.

参考文献

[1] 王维仁. 不只是地域主义: 乡建自述四书十二帖[J]. 建筑学报, 2018 (12): 1-9.

[2] 王维仁, 谢菁, 谭咏雯, 张思婷, 阮颖彤, 张羽, 徐翥, 谢民富. 香港新界菜园村[J]. 世界建筑导报, 2014, 29 (04): 90-93.

[3] 王维仁, 钟宏亮. 思考: 再织城市[M]. 香港: 牛津大学出版社, 2010.

[4] 崔愷, 王维仁, 邓小骅. 两岸·追问·回溯 崔愷/王维仁对话[J]. 时代建筑, 2012 (04): 50-55.

[5] 朱涛. 合院的重复与变奏——读王维仁的建筑实践[J]. 城市环境设计, 2011 (09): 78-81.

[6] 黄健敏. 台湾民众参与的社区营造[J]. 时代建筑, 2009 (02): 36-39.

[7] Mateo Kries, Jochen Eisenbrand, Alvar Aalto: Second Nature [M]. Vitra Design Museum, 2014.

图片来源

图1: <https://www.archdaily.com/783384/ad-classics-kings-road-house-rudolf-schindler>

图2: <https://www.alvaraalto.fi/en/architecture/studio-aalto/>

图3: <https://en.wikiarquitectura.com/building/polytechnic-university-of-helsinki/>

图4~图14: 由王维仁建筑设计研究室提供